

# 商周鉛器與考古學史論集

王世民著



藝文印書館印行

K826.41(4-5)

2011/1

## 商周銅器與考古學史論集

## 商周銅器與考古學史論集

王世民 撰

自序

## 一、商周銅器

1. 商周銅器考古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4
2. 殷代乙辛時期銅器的形制	15
3. 西周銅器密藏和有關西周史實的重要銅器	51
4. 西周時代諸侯方國銅器概述	60
5. 關於西周青銅器的分期斷代研究	92
6. 略說鄭縣新出西周銅器的形制和紋飾	97
7. 殷周時代的異類同鎔銅器	100
8. 西周銅器賞賜銘文管見	106
9. 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諸侯爵稱	114
10. 關於西周春秋高級貴族禮器制度的一些看法	138
11. 西周春秋戰國時代編鐘銘文的排列形式	151
12. 春秋戰國樂制中樂器和禮器的組合狀況	173
13. 最近十多年來編鐘的發現與研究	187
14. 爺侯墓地編鐘的再探討	199
15. 離曉兒子鐘的組合與年代	209
16. 略說吳地編鐘	214
17. 北京保利拍賣會上的一件西周銅器	228
18. 《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序	246



藝文印書館印行

商周銅器與考古學史論集 / 王世民著, -- 初版,

-- 臺北市：藝文，民 97.03

面；公分，

ISBN 978-957-520-138-8 (精裝)

1. 青銅器 2. 考古學 3. 文集

793. 07

97003026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三月初版

## 商周銅器與考古學史論集

精裝全一冊 編號：四一九九

定 價 新台幣二、〇〇〇 元整（外埠酌加郵費）

著 作 者 王世民

出 版 發 行 藝文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五三號四樓之三

郵 政 劃 機 000—96010

電 話 02—2362—6012

傳 真 02—2366—0977

E-MAIL yeewen@ms9.hinet.net

法 律 顧 問 蕭雄淋律師

北辰著作權事務所

印 刷 者 崇寶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經 銷 處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78-957-520-138-8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三一四號

# 商周銅器與考古學史論集

## 目 錄

自序 ..... 1

### 一、商周銅器

1. 商周銅器考古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4
2. 殷代乙辛時期銅器的形制	15
3. 西周銅器窖藏和有關西周史實的重要銅器	51
4. 西周時代諸侯方國銅器概述	60
5. 關於西周青銅器的分期斷代研究	92
6. 略說郿縣新出西周銅器的形制和紋飾	97
7. 殷周時代的異類同銘銅器	100
8. 西周銅器賞賜銘文管見	106
9. 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諸侯爵稱	114
10. 關於西周春秋高級貴族禮器制度的一些有看法	138
11. 西周暨春秋戰國時代編鐘銘文的排列形式	151
12. 春秋戰國葬制中樂器和禮器的組合狀況	173
13. 最近十多年來編鐘的發現與研究	187
14. 晉侯墓地編鐘的再探討	199
15. 應侯見工鐘的組合與年代	209
16. 略說吳地發現的春秋後期青銅禮器	214
17. 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收藏的部分西周銅器	228
18. 《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序	246

## 二、考古學史

19. 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歷程	251
20. 北宋時期的制禮作樂與古器研究	302
21. 記所見薛氏鐘鼎款識原石宋拓殘本	309
22. 羅振玉、王國維的生平及其主要業績	322
23. 《殷虛書契考釋》的羅氏原稿與王氏校寫	327
24. 馬衡的生平及其學術貢獻	337
25. 李濟的生平及其學術貢獻	341
26. 梁思永的生平及其學術貢獻	344
27. 尹達的生平及其學術貢獻	347
28. 鄭振鐸與文物考古工作	352
29. 鄭振鐸先生二三事	365
30. 夏鼐先生的治學之路	369
31. 傅斯年與夏鼐	389
32. 郭沫若與夏鼐	396
33. 郭沫若的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	403
34. 中國考古學史上劃時代的古文字學著作	436
——《郭沫若全集·考古編》	
35. 唐蘭先生小傳	438
36. 陳夢家的學術貢獻	440
37. 陳夢家遺稿《博古圖考述》整理後記	458
38. 關於王獻唐先生遺著《國史金石志稿》	461
39. 懷念陳邦懷先生	464
40. 懷念蔣若是先生	466
41. 我與馬承源先生的交往	469
42. 懷念、告慰與期望——紀念徐州博物館成立 30 周年	473

### 三、其他方面

43. 周都豐鎬位置商榷	479
44. 中國的古遺址和古墓葬	489
45. 東周墓葬概述	499
46. 春秋戰國時代的塚墓	505
47. 中國南方的楚墓	519
48. 喜看楚墓研究的新進展	528
49. 東周時期金屬鑄幣的發現與研究	533
50. 馬王堆漢墓在考古學上的意義	543
51. 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的主要收穫	554
52. 再說馬王堆漢墓發掘的意義	571
53. 我所親歷的《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修改定稿工作	575
54. 記述徐州西漢楚王陵墓的兩本書	579
55. 漢代紡織品的發現與研究	584
56. 唐卜天壽寫本《論語鄭氏注》殘卷說明及校勘記	593
57. 記吐魯番寫本《論語鄭氏注》「雍也」等篇殘紙	638
58. 所謂黃文弼藏唐寫本《文心雕龍·隱秀篇》是怎麼回事	667
59. 值得紀念的美好回憶	675

## 自序

記得少年時代同學作文，每有「光陰荏苒，日月如梭」的語句。時間確實過得很快，一向自感年紀尚輕，不知不覺，已經年屆七旬，白髮蒼蒼，明年將是自己由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到考古研究所工作的五十周年。

五十年間，除畢業前隨石興邦、王伯洪二先生，分別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遺址、長安張家坡西周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實習，剛參加工作時隨王仲殊先生進行漢長安城遺址的勘察發掘，此後由於種種原因，未再參與田野考古。先是相當時間從事秘書工作，繼而長期負責圖書資料工作，其間又不時參加集體編撰項目。現選擇五十年間撰寫的五十九篇文章編為本集。

本集中發表時間最早的，是因參加豐鎬地區考古發掘，於1956年末撰寫的《周都豐鎬位置商榷》。此後參加集體編撰項目，主要承擔西周和春秋戰國時期，例如《新中國的考古收穫》(1961年)的西周春秋部分，《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1984年)的西周窖藏銅器及整個東周部分，分別對當時各該時期的考古發現與研究，作過較為全面的評述，尤其關注兩周墓葬所見貴族等級和禮器制度。也曾偶而涉及其他時期，其中花費較多精力的是，參與長沙馬王堆漢墓報告的修改定稿，評述其各項重要發現在考古學上的意義；進行新疆吐魯番出土唐寫本《論語鄭氏注》的校勘研究，探討經學史上的某些問題。這些文章，都收入本集的第三部分「其他方面」。

其次，商周銅器方面。上世紀八十年代起，由於負責重點編纂項目《殷周金文集成》，參與編纂《中國青銅器全集》和《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後又參加「夏商周斷代工程」重點科研項目中「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專題，自己的寫作也就更集中于商周青銅器方面。其間，曾對殷周之際和西周時期青銅器形制的演變、西周諸侯方國青銅器的發展、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諸侯爵稱、西周和春秋戰國時期青銅禮器與樂器的組合等問題，發表自感稍有心得的專題論文。近年發表的《商周銅器考古學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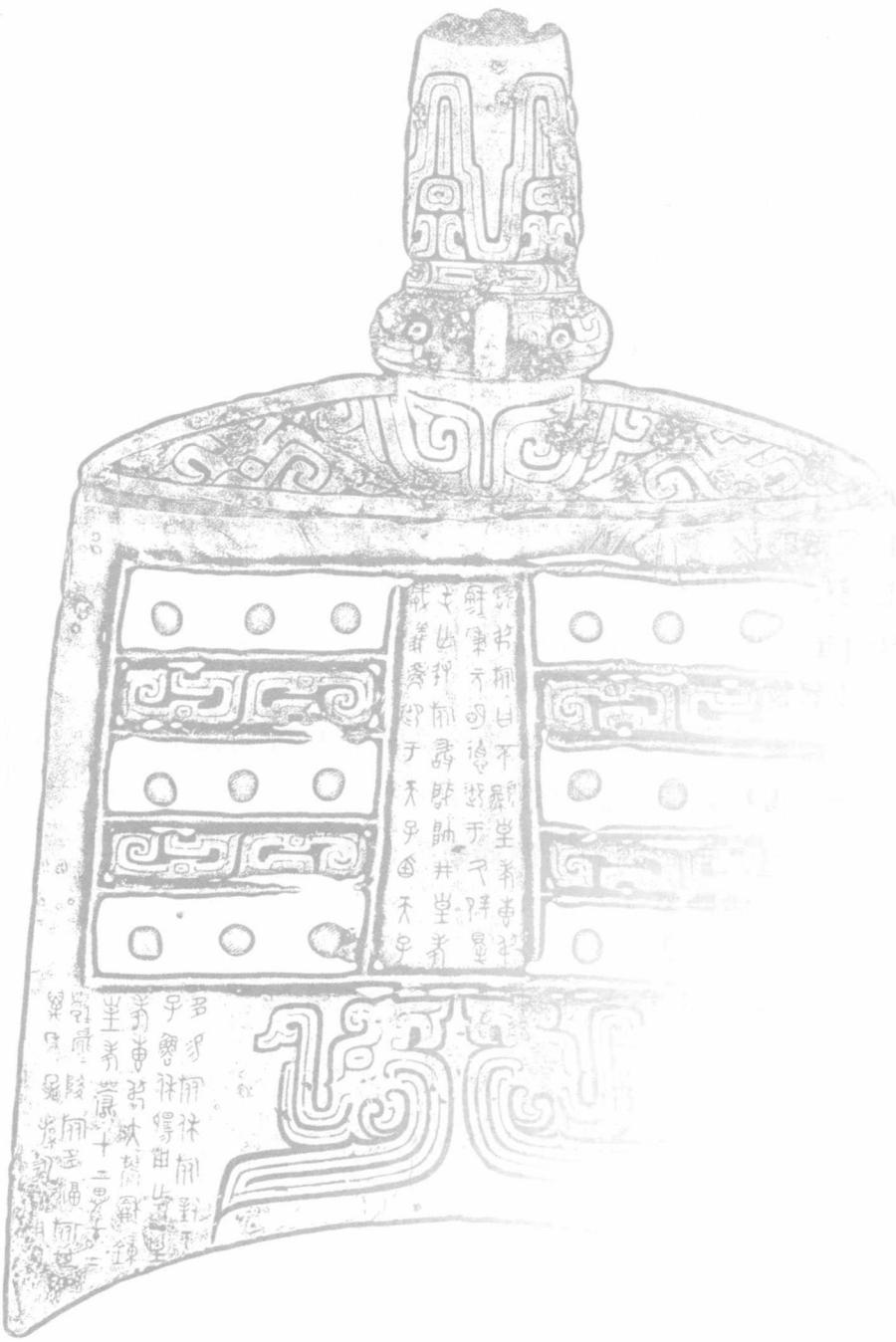
究的回顧與展望》一文，則是企圖從考古學的角度，回顧商周銅器研究的發展歷史，以期檢討薄弱環節，明確發展方向。

再次，考古學史方面。由於先後參與考古所學術秘書室、考古學會秘書處的日常工作，編輯過《中國考古學年鑒》，有較多機會聆聽夏鼐先生的教誨，感受諸多老一輩考古學家的風采，因而對中國考古學發展的歷史、現狀、人物、掌故，產生較大的興趣。關於李濟、馬衡、梁思永、尹達、陳夢家等老一輩考古學家生平與學術貢獻的文章，都是遵照夏鼐先生之囑撰寫，並在發表前經過夏先生的審閱。在夏先生主持下，參與編撰《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1986)，承擔考古學史方面的任務，系統梳理中國現代考古學發展的歷史，撰寫長條「中國考古學簡史」和「中國考古學史年表」，撰寫和修改著名考古學家和重要考古學著作條目。收入本集的《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歷程》，便是以此為基礎重寫的（「簡史」和「年表」，待進一步補充修改後，另行出版）。此後，又曾認真研究現存宋拓薛氏鐘鼎款識原石宋拓殘本、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手稿，詳細評述郭沫若、夏鼐兩位大師的學術貢獻，撰寫幾位過從較多的師友的小傳。

本文集的編成出版，全賴幾位臺灣朋友的熱情幫助。我是2001年12月因參加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所藏文物在臺北展覽的開幕活動，第一次前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訪問，與金文工作室同仁相識。後又於2005年1月，應邀專程前往史語所訪問。其間，我為《殷周金文集成》的重新出版，進行全面修訂，得到他們的大力支持；他們為編纂《新收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與我書信往還，以期把彼此的事情辦得更好。現特將前幾天承乏為《新收》所寫序言收入文集（這是文集中撰寫時間最晚的一篇），以紀念我與金文工作室同仁之間的深厚情誼。需要特別提到的是，承金文工作室陳昭容女士商酌本書篇目，謝佩霓、林宛蓉兩位小姐配製插圖和校正文字，更承臺北藝文印書館負責人陳鳳嬌女士慨允接受出版。又有我的同事馮時先生為本書題簽。謹向他們各位致以深切的謝意！最後還要感激吾妻榮麗華女士，我這微不足道的成績，是同她數十年如一日的全力支持分不開的。

2005年12月30日

# 一、商周銅器



# 商周銅器考古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商周銅器的研究由來已久。作為中國考古前身的金石學時期，商周銅器是其主要研究對象。諸多金石學著作，保存了大量的商周銅器資料。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以後，商周銅器研究逐漸走上考古學的軌道，隨著中國考古學的發展而不斷前進，成為中國考古學的一個分支。

## 一、二十世紀以前的商周銅器研究

二十世紀以前的金石學時期，從現存年代最早的北宋呂大臨《考古圖》(1092年成書)一書，到清代乾隆皇帝御纂的《西清古鑒》等四書，著錄銅器的模式一成不變，都是先摹繪圖形和銘文，再記度量衡資料，並進行一定的考釋，個別的交代出土地。

宋代的《博古圖錄》，對青銅器的名稱、用途、分類所作考證，卓有成績。許多器物和紋飾的名稱沿用至今<sup>1</sup>。

清代金石學者，精于鑒別，詳於考證，有其獨到見解。但在整體上與宋代相比，青銅器研究並無進步。

總的說來，這八百年間的青銅器研究，所據均為零星出土資料，斷代粗疏，未能形成體系。

## 二、二十世紀前二十多年的商周銅器研究

二十世紀初，近代考古學開始傳入中國，暫時還沒有中國學者進行考古發掘，也沒有類型學的器物研究，因而商周銅器研究尚未發生變化。

\* 本文原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新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王仲殊先生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05年。

<sup>1</sup> 劉昭瑞《論宋代的古器物、古文字研究》，見所著《宋代著錄商周青銅器銘文箋證》，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年。

與商周銅器研究有關的新情況主要是：(1)由於修築京漢、隴海兩大鐵路，導致大批古代文物的出土，其中包涵許多重要的商周銅器。(2)照相製版技術的引進，使商周銅器資料的傳播更為方便，更加準確。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許多珍貴文物流失海外。

這一時期的商周銅器研究中，羅振玉和王國維的貢獻最大。

羅振玉於 1919 年在致蔡元培的信中，提出「古器物學」這一新的概念，對商周銅器研究的發展有重要的推進作用<sup>2</sup>。他本人的具體貢獻是，收集殷墟等地出土的銅器，用珂羅版精印流傳。當時編印有《殷虛古器物圖錄》(1916)、《夢鄆草堂吉金圖》(1917)，繼而又有《貞松堂吉金圖》(1935) 等書。這些書都僅卷前有一序言，書中沒有說明文字，也就沒有準確斷代和比較分析。後來編印的《三代吉金文存》一書(1937)，收錄商周銅器銘文的拓片 4800 餘器，在此後數十年間是收器最多、行用最廣的金文集錄。

王國維在商周銅器研究方面，著有《古禮器說略》(內容包括《說肆》、《說觥》、《說盃》、《說彝》和《說俎》上下，見《觀堂集林》)，正確判別幾種器物的名稱。

外國學者的中國銅器研究，僅日本編印過幾種圖錄，例如《帝室博物館鑒賞錄·古銅器》(1906)、《支那古銅器集》(1910)，特別是濱田耕作編撰的《泉屋清賞》及其增訂版、別集和續編 (1919-1927)，同樣屬於金石學性質。

### 三、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至四十年代的商周銅器研究

這一時期，田野考古已在我國興起和初步發展，類型學研究也有一定的開展。商周銅器的研究，主要對象雖仍為傳世品和非發掘出土品，但已引進考古學的概念與方法。

非考古發掘出土的兩周銅器增加較多，主要有：新鄭李家樓 (1923)、渾源李峪村 (1923)、洛陽金村 (1928) 的東周銅器，寶雞

<sup>2</sup> 刊行時題為《古器物學研究議》；收入《永豐鄉人稿》甲編《雲窗漫稿》時，改題為《與友人論古器物學書》。

祀雞台（1927）、洛陽馬坡（1929）、濬縣辛村（1930）、周原函皇父組（1933）和梁其組（1940）等西周銅器，以及壽縣楚器（1931）。這些銅器，受到相關學者的關注，或編撰成書，或專文論述。

考古發掘已有一定的開展，但發掘出土的商周銅器並不太多，主要有：安陽小屯殷墟（1929、1931-1933、1936、1937）及侯家莊殷王陵區（1934-1935）、濬縣辛村西周衛國墓地（1932）、汲縣山彪鎮（1935）和輝縣琉璃閣（1935、1937）的東周大墓。這些資料，當時多未詳細發表。

這一時期，馬衡、郭沫若、容庚和陳夢家，對商周銅器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

馬衡於二十年代初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金石學，最早全面闡述古代銅器的類別、名稱、用途和時代特徵，並且論及考古學上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的進化。後又發表《中國之銅器時代》（1927）一文。

郭沫若的《兩周金文辭大系》一書（初版 1932 年，收兩周器共 251 器；增訂本 1935 年，收兩周器各 162 件），第一次將考古類型學應用于有銘文銅器的研究，創立標準器斷代法，區分西周之器的王世和東周之器的國別，初步建立金文研究的體系。該書的《圖編》部分，收銅器圖像 253 器，是第一部兩周銅器的簡要圖譜。他還進一步論述中國青銅器時代的發展，將其劃分為四期：即濫觴期（大率當殷商前期）、勃古期（殷商後期及周初）、開放期（恭懿以後至春秋中葉）、新式期（春秋中葉至戰國末年）<sup>3</sup>。

容庚直接接觸的國內資料最多，也能隨時看到國外的有關論著。所編《寶蘊樓彝器圖錄》（1929）、《頌齋吉金圖錄》（1933）、《武英殿彝器圖錄》（1934）、《海外吉金圖錄》（1935）、《善齋彝器圖錄》（1936）、

<sup>3</sup> 1933 年，胡光煒（小石）講述、曾昭燏記錄的《古文字變遷論》，在南京中央大學《文藝叢刊》第 1 卷第 1 期發表（見《胡小石論文集》147-173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也曾主張對銅器花紋與銘文作綜合研究，並且提出分作「殷與周初」、「宗周中葉以降」、「東周時列國」三期的意見，與郭沫若的意見相近（郭沫若的四期中，濫觴期當時尚無實證，實際上也是三期）。但因他們的文章流傳不廣，沒有引起學術界的注意。

《頌齋吉金續錄》(1938)、《西清彝器拾遺》(1940)七部銅器圖錄，收器總數達 800 餘件，突出特點是注重紋飾的著錄與研究<sup>4</sup>。後又以八年之功，著成第一部綜合性論著——《商周彝器通考》(1941)。該書全面闡述商周銅器的各方面問題，特別是劃分殷商、西周前、西周後、春秋、戰國五個時期，舉例說明各個時期銅器形制、紋飾和銘文的特點。所舉各類銅器多達 1031 件，分別按器形和時代排列，形成內容更加豐富的銅器圖譜。容庚另一部影響甚大的名著《金文編》，初版於 1925 年，又於 1939、1959、1995 年三次增訂再版，至今仍是最好的金文字典。

陳夢家編撰的《海外中國銅器圖錄》(1946)，卷前所附《中國銅器概述》一文，對商周銅器作更細的分期，又按地域分為東土、西土、南土、北土、中土五系，試圖進行文化系統的探討。當年他是國內唯一直接接觸大量海外資料的學者，曾廣泛考察流散北美和歐洲的中國銅器，並將美國、加拿大和北歐所藏中國銅器分別編成集錄，收錄商周銅器總計近 2000 件。其間又於 1945 年 11 月在美國中國藝術學會第六次年會上發表《中國青銅器的形制》為題的講演，對 250 多件銅卣進行詳細的類型學分析，討論其發展譜系與年代<sup>5</sup>。

另外，李濟發表《記小屯出土之青銅器》(《中國考古學報》第 3 和第 4 冊，1948)等文，根據 10 座墓的地層情況和所出銅器的器形分析，討論殷代青銅容器及鋒刃器的形制與演變。

這一時期外國學者的中國銅器研究，與中國學者基本上處於同一水準。日本的梅原末治以編撰內容豐富的圖錄著稱，根據形制進行銅器分類。所編大型圖集《歐美蒐儲支那古銅精華》(1933-1935)的彝器部分，收錄青銅容器 250 件。又編撰有《戰國式銅器的研究》(1936)、《洛陽金村古墓聚英》(1937)、《河南安陽遺寶》(1940)、《古銅器形態之考古學的研究》(1940)等書。英國的葉茲 (W.P.Yetts)，

<sup>4</sup> 《國立清華大學校刊》第 82 期 (1929 年 7 月 6 日) 報導，本年清華國學研究院畢業論文，有葛天民《商周器物圖案匯釋》一項 (轉引自孫敦恒《清華國學研究院史話》79 頁，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 年)。該文未見發表，內容不詳。

<sup>5</sup> 載《全美中國藝術學會年報》第 1 期 (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張長壽將其譯成中文，見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525-542 頁，中華書局，2004 年。

先是編撰《猷氏集古錄》(The George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and Corean Bronzes, Sculpture, Jades, Jewellery and Miscellaneous Objects, 1929)一書，1936年發表《中國藝術展覽》一文(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Burlington Magazine No.68)，將中國古代青銅器分為商殷、周、秦和漢式三期；1939年又在《柯爾中國銅器集》(The Cull Chinese Bronzes, 1939)中，重述這種分期意見<sup>6</sup>。瑞典的高本漢(B. Karlgren)著有《中國青銅器中的殷周時代》(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 BMFEA No.8)、《中國青銅器的新研究》(New Studies On Chinese Bronzes, BMFEA No.9)等論文，以郭沫若的銅器斷代為基礎，進一步探討殷周銅器的分期，並對紋飾作類型學分析。

#### 四、二十世紀五十和六十年代的商周銅器研究

這是中國考古學的全面發展時期，田野考古成為考古研究的主流。這個時期商周銅器研究的基本資料和研究方法，都與傳統的金石學完全不同，是商周時期考古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由於歷史的原因，當時已經發表的研究成果還不夠豐富。

商代田野考古的最大進展，一是發掘鄭州二里岡為代表的商代前期遺址，發現當時的青銅容器；二是對殷墟進行文化分期，但發掘中所作分期並未涉及銅器。鄒衡的《試論殷墟文化分期》一文(《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1964年4、5二期)，根據三十年代的發掘資料，將殷墟文化分為4期7組，其中包括殷代銅器的分期。

西周銅器的新資料，主要有長安普渡村長田墓，長安張家坡、扶風齊家村、郿縣李家村、藍田寺坡等窖藏，均經考古人員進行現場清理，有關學者多有具體論述。豐鎬地區的《灋西發掘報告》(1962)，將西周墓葬分期與銅器研究結合，根據出土銅器與大孟鼎、禽簋等標準器對比，推斷各期墓葬的絕對年代。

<sup>6</sup> 葉茲是曾昭燏留學英國時期(1935-1937年)的導師。葉茲提出與郭沫若、胡光煒接近的中國青銅器分期意見的論文和書，實得益于曾昭燏的襄助。曾女士當年的碩士論文《中國古代銅器銘文與花紋》，即持胡光煒的三期說(見《曾昭燏文集》51-182頁，文物出版社，1999年)。

東周銅器的新資料，主要有陝縣虢太子墓、壽縣蔡侯墓、信陽楚墓，以及其他東周墓。虢太子墓和蔡侯墓的墓主身份和年代都很明確，為東周銅器研究提供新的標準器群。《洛陽中州路》(1959)的東周墓葬分期，也是根據出土銅器與傳世銅器對比，推定各期的絕對年代。

鄭州、安陽、侯馬鑄銅遺址的大面積發掘，對於研究商代和東周時期的鑄銅工藝，有不可替代的典型意義。

博物館藏品圖錄，有臺北出版的《故宮銅器圖錄》(1958)，上海出版的《上海博物館藏青銅器》(1964)，其中都有許多重要的傳世銅器。前書因歷史條件的限制，印製欠佳。後書則是當時國內外印製最精的彩色銅器圖錄。

綜合研究方面，李濟與萬家保合作，對上世紀三十年代殷墟發掘所獲 170 多件青銅容器，進行詳細的全面研討（李濟負責形制花紋的比較研究，萬家保負責鑄造工藝的研究），於 1964-1972 年陸續出版《古器物研究專刊》5 冊，總計百餘萬言，但未進行殷墟青銅器的分期。郭寶鈞遺著《商周銅器群研究》(1965 年完稿，經鄒衡、徐自強整理，1981 年出版)，選取發掘出土的典型單位，以年代明確的器組為界標，進行分期研究。雖然分期稍嫌粗略，取材不用傳世品也有偏頗，能對發掘品作系統整理，據以探討商周銅器鑄銅工藝和形制花紋的演變，仍屬難能可貴。

陳夢家的《西周銅器斷代》一書 (1954-1966 年寫作)，在研究方法上對郭沫若的標準器斷代法有較大的發展。該書對 250 餘件判定王世之器和 100 餘件關聯器的銘文進行考釋，更加注重器物的多方面聯繫，將相關資料列舉得盡可能齊全；並且對西周的典章制度、歷史地理，特別是某些器形和紋飾的演變，作過比較深入的詳細論述。陳夢家這部未能最後完成的名著，經過我們根據遺稿進行認真的整理，2004 年初終於由中華書局出版。

這一時期外國學者的中國銅器研究，主要是日本學者的論著。梅原末治的大型圖集《日本蒐儲支那古銅精華》(1959-1962)，收集青銅器 400 件。水野清一的《殷商青銅器編年之諸問題》(見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殷代青銅文化的研究》，1953)，企圖從銅器銘文和器形兩個方面，區分殷代和西周銅器。又著有《殷周青銅器和玉》(1959)

一書，研究兼顧器形、花紋和銘文，將殷墟、西周、春秋、戰國均分為早、中、晚三期。樞口隆康的《西周銅器之研究》一文（《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第七，1963），更加注意新出器群與標準器的結合，也將西周銅器分作三期。

## 五、最近二十多年的商周銅器研究

最近二十多年是中國考古學進一步發展的新時期，商周銅器研究和其他方面的研究一樣，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豐碩成果。無論是資料積累，還是專題研究和綜合研究，都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

七十和八十年代多次發現大批重要銅器：商代有鄭州銅器窖藏、殷墟婦好墓、新澇大洋洲墓、廣漢三星堆祭祀坑等。西周有長安張家坡井叔墓地、周原莊白等窖藏、寶雞漁國墓地、洛陽北窯墓地、琉璃河燕國墓地、平頂山應國墓地等；東周時期有淅川春秋楚墓、太原晉國趙卿墓、隨縣曾侯乙墓、平山中山王墓等。

商周銅器資料的豐富積累，使有關研究出現新的局面。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是目前最完備的商周銅器銘文選編。該書1-4冊（1986-1990），選錄具有相當史料價值的銅器銘文925器，並且進行簡要的注釋，其中商器21件、西周器512件（判定所屬王世或期別）、東周器392件（區分所屬國別）。第5冊索引，尚未出版。

關於商代銅器，張長壽《殷商時代的青銅容器》（《考古學報》1979年3期），以七十年代以前的發掘資料為對象，根據出土層位和共存關係，結合器物的形制、花紋、銘文和組合形式，系統考察商代早、中、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銅容器的特點。鄭振香、楊錫璋等合著《殷墟青銅器》（1985）一書，則選取1958-1982年殷墟發掘出土的200多件銅器，根據遺址和墓葬的分期進行全面研究，闡述各期銅器的形制、組合形式和裝飾特點。

關於西周銅器，唐蘭晚年遺著《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寫作於1976-1978年，為未完稿，考釋寫至穆王（計176器），穆王以後僅存釋文，所作論述對形制、紋飾偶有涉及。吳鎮烽為《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所寫概述（1979），盧連成的《陝西地區西周墓葬和窖藏出土

的青銅禮器》(《寶雞強國墓地》附錄, 1988), 將陝西新出土的西周銅器, 與傳世標準器結合, 進行全面的排比分析。李學勤的《西周中期青銅器的重要標尺》(1979)一文, 根據周原的莊白、強家兩處銅器窖藏資料, 深入討論過去缺少典型資料的西周中期銅器斷代問題。劉啓益關於西周銅器斷代研究的一系列論文(2002年連同關於西周年代的論文, 出版為《西周紀年》一書), 選取400多件傳世和發掘出土的西周銅器, 採取從月相定點說出發的「干支聯繫與排斥法」, 將其串聯成許多銅器組, 結合根據考古類型學排比的器形和紋飾特點, 排比分析這些銅器組所屬王世。

東周銅器方面, 開始進行分區研究。高明的《中原地區東周時代青銅禮器研究》(《考古與文物》1981年2-4期), 是發表較早的一篇長文。該文選取22個典型單位, 先將其歸納為10組, 考察東周時期禮器組合的變化; 再分析各類銅器器形和花紋的特徵, 討論它們的演變規律。後來, 又有學者對楚、虢、齊、燕、秦及吳越的青銅容器的分期及相關問題, 作過不同程度的討論。

商周銅器紋飾的專題研究, 過去國內學者的研究比較薄弱。陳公柔、張長壽發表關於殷周青銅容器上鳥紋、獸面紋斷代研究的論文(《考古學報》1984年3期、1990年2期), 以考古發掘資料為主, 進行類型學的排比分析, 探討兩種重要銅器紋飾的發展軌跡。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紋飾》(1984)一書, 是目前國內唯一的銅器紋飾論著。該書以上海博物館藏器為主, 收錄銅器紋飾拓片1006幅, 按其類別和型式編成圖譜。卷前綜述和類別說明, 對商周銅器紋飾的發展階段, 各類紋飾的構圖特點和流行時間, 分別作了論述。

這一時期外國學者的中國銅器研究, 首推日本學者林巳奈夫的《殷周青銅器綜覽》1-3卷(1984、1986)<sup>7</sup>, 再有白川靜的《金文通釋》

<sup>7</sup> 林巳奈夫的《殷周青銅器綜覽》, 第1卷《殷周時代青銅器之研究》, 包括「總論」(「發現、搜集與研究史」、「器種之命名」、「禮器之類別與用法」三章)及「殷—春秋前期的青銅器」; 第2卷《殷周時代青銅器紋飾之研究》; 第3卷《春秋戰國時代青銅器之研究》。所附數以千計的圖像, 包括歷年考古發掘出土及世界各地博物館藏品, 採取類型學方法進行型、式排比, 彙編為翔實的青銅器器形和紋飾圖譜。這是日本學者編撰的最大部頭的中國青銅器著作。